◆观 点

唤醒沉睡网站倒逼政府活力

正当“政府APP僵尸化”的新闻引起舆论争议之际，针对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大检查已然来临——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部署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次普查。此次普查的时间是从2015年3月至12月；普查目的是，摸清全国政府网站基本情况，有效解决一些政府网站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等问题，力图消除政府网站“僵尸”“睡眠”等现象。

因为普查对象覆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网站，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政府及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等，所以肯定是一项巨量工作。为何普查？盖因从新世纪政府信息化建设形成声势开始，大量政务网站就处于休眠和半休眠状态，以至于近年来的舆论场上，每隔一段都有“唤醒沉睡政府网站”的声音出现。意在展示服务型政府现代意识的政府网站，却集中暴露了其懒政、“在上位者”的姿态，不得不说是一种奇特景象。

现代政府不是只需要一张数字化的“脸”，根本说来，这张脸只是一个政府运作效率、质量的终端效果。以为信息化建设就能塑造现代政府角色，这种想法不啻倒果为因；而不断在政府信息化工具上仓促更新换代，这和传统的上项目、建形象工程来博政绩的思路并无差别。回看这些年政府信息化建设之路，从网页到微博、从微信公号到APP，“僵尸化”的诟病始终如影随形，这足以透露出两个现实：一是政绩思路只能导致信息化泡沫；二是地方政府改革的实际效果还远跟不上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

往深层说，政府网站的僵尸化，其实是现代政府形式与传统政府运作方式之间矛盾的产物。信息化建设要求政府事务公开透明，一些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却更愿意人事、财务闭门运作；互联网时代崇尚交互信息，他们却下意识保存着向老百姓宣教的习惯。政府网站的僵尸化以及其他网络工具的休眠，归根结底都因为，网站表现出的服务态度和政府实际服务能力脱节，网站表现出的开放姿态和政府现实的工作惯性相悖。

中央此次普查僵尸政府网站，可谓应时顺势之举。一方面可以为评估政府网站建设、政务公开情况设立更科学周详的标准，比如，如何评估这些网站的活跃性和影响力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此为抓手，解决一些地方民众长期得不到回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应通过这种集中普查测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进度，倒逼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加快改革。唯此，才能缩小横亘在政府信息化形象和实际效能之间的那道鸿沟。（2015年3月25日半月谈网 刘白）

尽快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的条件

从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开始，中国经济的转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年和明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因此，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再平衡。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

一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置换，这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加快。

二是要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三是基础产业领域要切实“放大”，放大是打引号的，就是要放开准入，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是必须转换效率，提高效率。

四是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样一个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因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趋缓，而城市资源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更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五是要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六是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比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且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绿色的产业基金、绿色的债券、绿色的银行等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会有十年或者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2015年3月3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刘世锦）

怎样用好质询权

质询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项重要权力，提出质询案，是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在中央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多次强调要丰富和完善人大监督方式，通过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提升监督效果。

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讲，各级人大在质询权的应用方面，与其他监督方式，比如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专题询问等相比，运用的次数不多、信心不足、力度不大，甚至不敢用、不愿用，这与它作为一种刚性的监督手段的地位并不相符，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一定的距离。

用好质询权，首先需要解决认识问题。在一些地方，代表行使质询权，往往担心被指责和“一府两院”唱“对台戏”。有的党委和人大领导，也因怕影响团结、破坏稳定、弄僵关系，而不愿意让代表和委员行使质询权，进而说服代表改为提出批评和意见建议。实际上，质询只是众多监督方式中的一种，虽然刚性强，但也未必就要引发冲突和矛盾，更不是要唱“对台戏”。用活用好质询权，反而会推动“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而促进依法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用好质询权，也需要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要想让质询权不再处于“休眠”状态，需要代表提高责任意识，积极依法履职，还需要代表增强履职能力，能够科学、合理地用好质询权。尤其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上，只有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努力钻研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有价值的质询案，比如近期广西梧州市10名人大代表就梧州市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案件联名提出质询案，市检察院负责人按照质询程序就此案的办案程序和法律依据向代表们作出了说明，质询案最终依法妥善解决。梧州市这次质询，提出质询的代表如果不对案情涉及的法律专业知识研究透彻，质询是难以有效开展的。

质询权的有效行使更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法律规定，只有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代表才能依法提出质询案，并且经过主席团决定才能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但我国多数地方，县级以上人大全体会议，每年都只召开一次，所以代表的质询权行使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虽然开会次数多，但委员也只有在会议期间才能提出质询案。而且现行法律对质询案的内容和范围、提交期限、准备时限、质询人的发问、被质询者的答复和辩解等均未作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对相关的法律责任也缺乏具体规定。即使目前已经常使用的专题询问监督方式和质询的内涵、行使方式之间的区别，也需要法律予以厘清。今后，应当结合实际，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使质询权行使的流程更加明确。（2015年4月1日《京华时报》朱恒顺）

◆史海钩沉

长征中鲜为人知的重要会议

2015年1月，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应该说，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除了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还有很多的重要会议。笔者整理到的属于红军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从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底仅一年时间，在党史上有记载的比较重要的就多达24个。

这些长征期间重要的会议，按照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时间范畴来划分，总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的会议，总共10个会议。时间范围是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5月31日。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会理会议、苟坝会议、泸定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初期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通过这一时期的会议，红军改变了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决定西入川黔，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后来根据实际情况，红军又改变了在川黔建立新的苏区的计划，最终定下了翻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新计划。这一时期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派人着手恢复白区被摧毁的地下党组织。

第二个时期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会议，总共8个会议。时间范围是1935年6月26日至1935年9月12日。它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牙弄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这一时期的会议没有实现与张国焘求得团结、共同北上的结果，但是最终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

第三个时期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会议，总共6个会议。时间范围是1935年9月20日至1935年12月25日。它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这些会议就是不断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这一时期的会议最终决定了红军的落脚点为陕北，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也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时期。

遵义会议的确很重要，但是长征中的其他会议也不能被忽视。比如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补充，苟坝会议上成立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三人团，完善了遵义会议关于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变动，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通过了解诸如苟坝会议这些长征中鲜为人知的重要会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央红军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战略大转移、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最终开创了革命新局面的真实情况。（2015年第1期《党史博览》刘建全）

◆评 论

聚光灯下选官应成“新常态”

3月23日，山西省16名新任命的省管干部集体亮相，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不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而是“山西”和“选官”这两个关键词太吸引眼球。据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在经历塌方式腐败和省委改组性重大调整之后，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人，这16人是第一批调整提拔使用的干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下了很大功夫。

山西反腐一年多，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和刮骨疗毒的决心。但不可否认，这也对山西形象和干部士气造成了负面影响。多达近300个重要岗位空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发生腐败窝案的地区和部门，主要领导接连落马，大量干部空缺，当地改革发展任务的推进，肯定会受到影响。工作必须有人干，空缺需要尽快补上，这是稳定大局和人心的重要一步，但也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把带病的干部提拔上去，或者刚提拔又发生腐败，这对调整后的山西省委，是一个重大挑战。

为选拔这首批16名省管干部，山西省委做了大量的调查、甄别工作。在严格执行中央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又从实际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公开了考察对象相关信息和考察组成员有关情况，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如果提拔后干部再生病，除了追究当事人，还要追究组织部门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在举国关注的聚光灯下，在刮骨疗毒式的反腐之后，经过最严程序选拔出来的干部，本身就是沙里澄金，应更能经受住考验。在塌方式腐败的官场，还能坚持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本身就难能可贵，是值得珍视的官场正能量。对他们应该充分信任，委以重任，可以重树山西干部队伍形象。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放松对他们的监督，要把关注的压力化为动力，借此树立法律和制度权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约束，推动政治生态的重建。否则，只靠个人的定力和自觉，很难对抗各种诱惑的围猎。“山西省管干部缺口近300人”的消息出来时，有人调侃说要赶紧改行去山西当官；但很快有人提醒，如果政治生态不改善，你去了说不定也会很快落马。这虽是戏言，却也令人警醒。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劣币驱逐良币，腐败几乎成了潜规则，好人也会很快被腐蚀。

这提醒我们，在“打虎拍蝇”的同时，制度建设也要加快推进。干部选拔严格遵守法律和程序，选拔提任前要层层审核把关，把考察对象和考察者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山西选拔这16名省管干部的做法，也应成为今后选拔任用干部必须遵守的规范。制度的完善和政治生态的改善，应成为反腐最大的红利。（2015年3月26日新民网 铁永功）

◆纵 横

破产城市底特律复兴的启示

城市的复兴是整体复兴的结果，2014年美国经济明显复苏，今年失业率明显下降，消费信心提升，对于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城市是个大好消息，汽车消费的提升有利于汽车城复苏。如果没有美国经济复兴护佑，底特律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破产重组对于仍有希望振兴的企业与城市是必要的。

首先是摆脱债务负担。申请破产时底特律市负债180亿美元，削减几十亿美元的无担保负债，由于破产保护，超过10万个分散的债权人无法追索。不仅如此，底特律还得到了州政府的资金支持。

其次是底特律可以摆脱沉重福利负担。强大的工会与公务员，不得不面对城市破产的局面，很多人选择提前退休。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法官史蒂文·罗兹裁定，尽管密歇根州宪法保障公务员的退休金，但退休金权益是一种合同式权益，因此不能在城市破产时获得保护。媒体分析指出，市政府可以据此削减退休公务员的其他权益，这为底特律解决拖欠投资人和债权人数十亿美元打开了大门。

再次是破产城市的低资产价格，吸引了国际国内的投资者。新的百亿元左右的商业投资，重新回流的人口，相比破产保护时降低了一半左右的失业率，新的商业设施，新的冰球场，新的连接加拿大的大桥和连接北部与市中心的M-1轨道项目等，大规模的基建正在兴起。同时市政的街灯、垃圾回收、清理老旧建筑等都在有序推进。

底特律是幸运的复兴城市，美国有的中部矿产城市还没有复苏，资源可以带动城市兴起，也可以毁灭城市。对于底特律来说，考验还没有过去，能否成为新的汽车创新中心决定了底特律的前景。

底特律也在变化，多样化产业结构，中城集中医疗科研和教育产业，下城是IT、广告等新兴产业的聚集地。除非底特律在技术研发、新潮流车供应链上有独特优势，否则，在天翻地覆的产业重构时代，复苏来之不易，失之容易。（2015年3月25日《大河报》叶檀）

历史上的胥吏之害

旧时的地方官，一般由朝廷任命，由外地前往任职；而胥吏则基本上由本地人担任。胥吏是官长的助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小公务员。北宋时福州有个夏铎，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开始，直到政和年间（1111—1118年）为止，一直担任办理文书的胥吏，前前后后长达“四纪”，即48年。最后，有关部门因为他年纪大、资格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将他由吏提拔为官。只不过，彼时距离北宋灭亡，已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

北宋官僚机构特别庞大，地方府州设有知府、知州、同知、判官、推官、通判、户曹、法曹、司理、参事等，他们都是有任期的，这样，夏铎在数十年间所接触的各类官员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于是，当他升官后不再担任胥吏时，就坦率地对人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哪，没有不被我们这班胥吏欺骗的；这么多年来，不能欺骗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以光禄卿的身份出任福州知府的程师孟，另一个是曾经担任过太常博士的福州司理罗畸。

程师孟字公辟，《宋史》有传，他文武全才，堪称北宋名臣：在南方，他有效挡住了蛮族首领侬智高的进攻；在北方，他出使契丹，折冲樽俎，大义凛然地维护了宋朝的尊严。担任地方官时，他冒着被朝廷惩罚的危险，开仓赈济灾民。他明察秋毫，断案如神：担任江西转运使时，了解到因为胥吏与盗匪勾结而无法破案，便毫不犹豫地将那班胥吏关进监狱，使积案很快告破。他先后在洪州、福州、广州、越州担任地方官，离任后当地百姓都为他建立了生祠，以表达人们的景仰之情。

罗畸字俦老，也是个精明强干的“能员”，初到福州时，那些胥吏们谁也不敢耍奸使诈。可是时间一长，他们渐渐发现了这位司理大人“亦有罅可入”（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六）。原来，罗畸特别喜爱读书，而且读起书来特别认真——正因为他的好学与渊博，才能胜任太常博士一职。不过，当罗畸读书钻研并有所领悟时，常常会高兴地仰天长啸；一旦对书中涵义不能理解时，又会紧锁眉头，抓耳挠腮。于是，当他仰天长啸时，你抱着文牍让他批示，即使其中有不少机巧变诈，他也会毫不在意地大笔一挥：批准！倘若他抓耳挠腮时去找他，那可惨了：即使稍有欺诈之处，他也会立即看破。既然掌握了这个规律，或者说，看到了司理大人的这个弱点，胥吏们要想耍点奸、使点诈，可就容易多了。正因为如此，夏铎又得意地说：“像罗司理那样精明能干而又特别爱读书的官员，尚且被我们欺骗了，更何况其他人呢！”

如此看来，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福州地区不受胥吏们欺蒙坑骗的官员，唯有区区程师孟一人，简直是凤之毛、麟之角；而程师孟在福州，又只有短短的两年！

多么可怕的胥吏！

更为可怕的，是那日益腐败的北宋政权，是那不可能将权力真正关进笼子的皇权体制——永远走不出“治”“乱”循环的皇权体制。于是，没过几年，就内有农民起义，外有金兵入侵，腐朽不堪的北宋王朝迅速灭亡，连它的最高代表——徽、钦二帝，也成了金人的俘虏。（2015年第1期《唯实》沈淦）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010）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